家庭社會化和意識型態：
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的世代差異*

（台灣社會學研究，No.3，1999）

吳乃德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美國及西歐民主政體中選民投票行為的研究，都有相同的發現：「政黨認同」是影響選民投票的最重要因素。政黨認同是選民對某一政黨的長期性依附。因為它長期穩定，因此它影響政黨體系的穩定。由於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投票行為，因此它在選民中的分佈，影響政黨之間的勢力平衡；它在選民間的大幅度變動，或「重組」(認同的轉移)、或「解組」(認同的放棄)，也導致政權交替和政治版圖的劇變。也就是說，選民對不同政黨在個人層次的認同和依附，不只影響他個人的投票決定，在集體層次上也影響甚至改變了整個政黨體系和政治風貌。

國內政治學界過去幾年對選民投票行為的研究，也發現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的存在，以及它對投票決定的高度影響力(如徐火炎1991、1993，何思因1994)。同時，過去的研究也發現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的主要基礎和分界線是社會分岐：族群背景(Chang [張茂桂] 1989)、民主態度、和民族認同(吳乃德1993；游盈隆1996)。台灣選民以社會分岐為基礎，對代表不同意識型態的政黨形成認同；而且也根據這項認同來決定其投票支持的對象。

由過去台灣政治發展的經驗來看，以上發現頗符合我們對台灣政治的觀察。然而台灣政治在過去十多年有極大的變化。一方面，威權體制瓦解、白色恐怖不再，民主體制也順利建立；而另一方面，民族認同的分歧雖然依舊，可是在兩個大黨之間的對立卻也趨於和緩[1]。如果意識型態的差異，在過去形塑了對不同政黨的認同，那麼在意識型態分岐逐漸消逝的新政治局面下，台灣選民的政黨認同將產生何種變化？更具體地說，由於政黨認同一般而言是長期穩定的，原有的認同者不會在短期內改變他們的認同。可是**成長於意識型態分岐逐漸消逝中的新政治世代，其政黨認同的基礎是否有別於上一代？如果是，其政黨認同以什麼為基礎？**這是本文試圖回答的問題。

本文將從「家庭社會化」的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家庭或許是人類最重要的社會單位。人誕生、也成長於家庭之中。在人類社會生活的所有面向，包括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家庭都是個人最重要的資源和泉源；儘管在不同的歷史階段

*本文發表於台灣政治學會年會，台北：1998, 12, 12-13。本文所用資料爲國科會所資助的「台灣社會變遷訪問調查計畫政治文化」，計畫編號 87-2412H-001-014-B1。感謝劉義周教授對本文的論點和簡化表格所提供的建議，以及本刊三位匿名評審的修改意見。也感謝其中一位評審，如果不是他對初稿的批評和退稿的裁決，本文不可能以目前的面貌出現。

[1] 並非台灣所有的政黨對民族認同都逐漸產生共識或合流。在 1998 年的選舉中，新黨的趙少康宣稱，國民黨和民進黨在台灣獨立議題上的合流是「魔鬼」，而「只有新黨可以打擊魔鬼」(中國時報 1998, 11, 23)。

和社會政策下，其重要性有所不同。家庭的經濟條件、教育水準、和文化資源，很大程度決定一個人的教育成就、經濟所得、和社會地位；家庭的文化品味經常在下一代身上複製；家庭成員之間的凝聚度，影響個人的感情和人格成長。家庭是每一個人在這個「冷酷世界中的天堂」(Lasch 1977)。社會幾乎所有的文化價值都透過家庭而傳遞給下一代。在個人政治態度的形塑上，家庭應該也扮演重要的角色。這是六０年代興起於美國、於七０年代急速衰退的政治社會化研究的基本假設。而美國政黨認同的研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持續實證資料支持的發現即是：美國選民政黨認同的形成，*家庭社會化*是最重要的因素。大多數美國選民的政黨認同在青少年時期即已形成；形成的主要動力是，父母的政黨認同透過家庭社會化對下一代的傳遞。在後來的生命階段中，早期形成的政黨認同雖然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而可能有所改變，可是整體而言仍然維持高度的持續性。

可是國內有關政黨認同的研究卻一直忽略家庭社會化的變數。第一個原因是政治環境的不同。在社會和政治分岐較為顯著的政治體中，政黨經常代表某種特定的立場，而選民也根據自己的意識型態立場，形成對代表該立場的政黨的認同。上述所提及的各項研究也都清楚描繪了這樣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個人的意識型態立場似乎比家庭社會化，對政黨立場的形成有更大的效果。第二，在過去的威權統治時期，反體制意識型態的支持者只是人口中的少數。大部份的民眾，不論是父代或子代，都成長、生活於被威權政府控制的教育系統和主流媒體輿論的環境中。父子兩代對正統意識型態的同樣皈依，父子兩代對威權政黨的一致認同，不一定是家庭社會化的結果，而可能是兩代同時受到大環境形塑的結果。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無法評估家庭社會化的影響力。第三，具有反體制意識型態的全國性反對勢力，出現於七０年代。九０年代末期之前，比較完整的新世代交替仍未出現。時間的限制讓我們很難分析，認同反對黨/反對勢力的選民對其第二代可能有的傳遞效果。這些政治結構的條件和時間的限制，都使家庭社會化難以在理論的探索中成為重要的因素。

可是在九０年代末的今天，這些結構性條件和時間限制都已經改變。在民主化之後，政治意見和意識型態的自由市場已經出現。反對黨的支持者也已經陸續產生他們的第二代。而更重要的，成長於八０年代末台灣政治自由化前後的年輕選民，已經構成一個完整的年齡層（20-30歲）。時間和政治結構的變化，都讓我們比較能適切地分析家庭社會化對政黨認同的影響。

本文的目標即以年輕選民為對象，評估家庭社會化對政黨認同的影響。本文的主要發現是：第一，就年輕代的民進黨支持者而言，家庭社會化是其政黨認同最重要的基礎。即使在現階段，中、高年齡層民進黨認同者的政黨認同，仍然是以意識型態為基礎。可是新世代選民對民進黨的認同卻和意識型態卻很少關係。如果其父代是在社會互動、經濟活動、及政治體系的公領域中形塑他們對政黨的認同，子代卻是透過完全不同的社會過程和場域：在家庭生活中的私領域學習這樣的認同。第二，這種政黨認同的父代傳遞效果，同時也發生在國民黨的認同者當中。而且，在新世代的國民黨認同者中，意識型態的影響效果同樣地不顯著。民主態度、族群認同和民族認同，在國民黨認同者中的分佈和民進黨的認同者差距不大。這兩項發現讓我們肯定了：成長於不同政治環境中的不同政治世代，政黨認同的形成來自完全不同的基礎。台灣近十年的政治變遷，導致了形成政黨認同之基礎的甚大變化：從公領域的政治意識型態轉變為私領域的家庭社會化。這個

發現以台灣的資料初步肯定了美國政治學關於政黨認同的理論。如果這個趨勢在未來持續下去，台灣政黨政治的風貌或會有巨大的變化。除此之外，這樣的發現也暗示：我們對民眾政治態度和政治行為的研究，似乎有必要擴充至社會學的領域。

本文第一部份將回顧美國政治學對政黨認同的研究發現。在這部份的討論中，我們將把焦點集中在：政黨認同對政治發展的重要性、政黨認同的原始概念、以及在不同於美國政黨體系的國家中測量政黨認同所面臨的難題。除此之外，也是更重要的，我們將討論在政黨認同之形成中，家庭社會化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第二部份則以台灣的實證資料分析不同政治世代的選民，政黨認同的不同基礎。我們將以兩代之間政黨認同的一致性，做為家庭社會化的指標。

一、政黨認同研究的回顧

密西根大學所主導、以美國全國選民為研究對象從事的投票行為訪問調查研究，可算是美國政治學的第二次重要革命。不論是在巨觀的政治變遷的研究上、或微觀個人投票行為的分析上，以這些調查資料和其所隱含的理論模型為基礎而從事的研究和著作，都為美國政治分析提供了許多嶄新的視野。在這個一般稱為「密西根模型」的選舉研究傳統中，「政黨認同」(party identification)或許是其中最重要的概念和理論上的創新。正如幾位學者所指出的，「在短短二十年中，政黨認同已經和權力、權威、合法性、穩定等名詞一樣，成為專業政治學者的日常語彙。」(Budge et al. 1976:3)「『政黨認同』...可以說是一九五O和六O年代，最光榮耀眼的變項。」(Shively 1980:219)由於這個概念（或變項）的重要性，以及它對美國選民投票行為的解釋力，它立即被研究其他國家投票行為的學者所採用和複製。事實上，「政黨認同」這個概念的重大貢獻，並不只限於對微觀的個人投票行為的解釋。對巨觀的政治發展，「政黨認同」也提供了另一個全新的分析角度，例如：選民對政黨的長期穩定的認同，解釋了政黨體系或民主政治政黨競爭的穩定。

《美國選民》一書的幾位作者，首先提出密西根模型中「政黨認同」這個重要的概念和變項。他們認為，V. O. Key先前所觀察到的美國選民在政黨支持上的「固定性決定」(standing decision)現象，其實是選民對政黨有所認同的反映，亦即對政黨的依附和效忠。他們將這種依附現象界定為一種「心理上的認同」。這種心理上的認同，界定了一個人和他／她所屬的團體的關係。(Campbell et al. 1976:121)對於「政黨認同」的定義，該書原始作者之一中的Warren E. Miller有更清楚的說明。他說，「之所以使用『認同』這個字眼，是為了表示[這個模型的]一個基本假設，那就是：這項[個人和政黨之間的]關係經常牽涉到自我的延伸。」「選民透過個人對政黨的認同而自認屬於一個政黨，這樣的基本假設來自社會心理學的理論：我們每一個人大部份的私人認同，都來自我們所屬的團體。因此，宗教認同類似政黨認同的概念。這兩種體制（亦即群體），都界定了個人以及社會生活中與群體有關的諸元素，兩者之間的適當關係。...群體的遭遇就是個人的遭遇；當群體興盛或消亡，個人也繁榮或受苦。」(Miller 1976:22)。

以上說明充分顯示了，「政黨認同」這個概念在原始理論中的意義。正如社會心

理學中「認同」的概念，它指的是個人以群體中一份子的身份來界定自己。社會存在著不同的群體，屬於這些群體的個人經常以這些群體成員的一份子來界定自己的身份。這樣的自我界定和歸屬，形成個人社會態度的重要基礎之一。因此政黨認同的本質不但是「心理」的，它也包含「群體」的概念，是一項「自我的延伸，將自我視為一個群體的一部份」。(Miller & Shanks 1996:120)這是「認同」的核心。我們或許應該從這個核心來理解密西根模型中「政黨認同」的概念。也唯有對它做這樣的理解，我們才能欣賞密西根模型對投票行為的理論貢獻。我們用宗教認同來加以比喻或許更容易理解。Miller在許多地方都用這樣的比喻來說明政黨認同的概念。當一個人說他是Democrat或Republican的時候，就像是在說他是一個天主教徒或猶太人；他屬於天主教徒(或democrats)這個群體的一份子。教會(或政黨機器)只是詮釋教意(或宣示政策立場)的組織。他可能贊同也可能不贊同代表這個群體的組織(教會或政黨)的立場。「不論是宗教認同或政黨認同，都不必然和一個人其他的態度或思想立場有所關連。」(Miller 1991:748)。

也就是說，這種意義下的政黨認同和政黨的政策主張較不相關。當選民的政見立場和他所認同的政黨的政策主張有所歧異，選民並不一定會改變他原先的政黨認同；當他投票的時候，也仍然有很高的機率投給他所認同的政黨。密西根模型的理論貢獻，正是發掘出這項和政治立場無關的社會心理學變項。它最大的貢獻也正在於，以非政治學的變項解釋了一個顯著而重要的政治現象：美國政黨勢力的長期穩定。美國的兩個主要政黨，它們在不同的地區都擁有各自的地盤，而且都維持相當長期穩定的狀態。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顯然來自選民對政黨的長期依附。另一方面，先前的研究同時也發現：美國大多數的選民對政策並沒有特別的意見，對政黨的政策立場不甚了解，而也不甚清楚各政黨在政策立場上的差異。美國的選民在這種政治興趣不高、政治知識不充分的情況下，為何仍然會對政黨有長期的支持傾向？密西根模型的作者們，從社會心理的領域回答了這個問題：家庭社會化的結果。它和過去投票行為的理論模型最大的不同，它對投票行為研究的貢獻，也正是在這個社會心理學的層面。密西根模型之前的投票行為理論(如哥倫比亞大學的選舉研究)，大多將焦點放在選民如何做「抉擇」。在每一次的選舉中，選民如何做出他們的投票決定，其決定的過程，初級團體、社會團體的影響力等。這些變數基本上都是屬於「短期」的因素。事實上，《美國選民》一書的作者們也發現：對政黨有所認同的選民，在政見立場上也大多和他們所認同的政黨一致。到底是短期的政見立場影響了長期的政黨認同，還是政黨認同影響了政見立場？如果是前者的話，那麼密西根模型和先前的投票行為理論就沒有太大的差別，而密西根模型也就沒有太大的貢獻。該書的作者所試圖指出的正是後一因果關係，亦即：對政黨的社會心理認同，影響了選民的政治意見。「我們相信：我們的資料顯示了，[選民對]政黨的長期承諾(commitments)形塑了他們對政治事務的意見。」(135) 密西根模型的作者們超越了先前的視野，提出存在於選民心中、一個較長期的社會認同因素。這應該是它最大的貢獻(Crewe 1976:49)。

儘管密西根模型在極短時間內受到相當的注意和接受，並且大擴充了美國政治學投票行為理論的視野，可是並非完全沒受到批評。其中最重要、也最激進的是Fiorina(1981)對政黨認同核心內涵的重新詮釋。如上所述，原始密西根模型政黨認同理論的核心，是選民對政黨在心理上的依附或連結。可是Fiorina卻認為政黨認同其實只是反映，選民對政黨和其領導人物過去表現的評價。因此政黨認同不是選民對政黨長期穩定的心理依附，而比較是選民對政黨表現所打的成績分數，

而且是經常變動的分數。在這種解釋下，「政黨認同變得比較類似對總統的贊許度，而非原始所類比的宗教社群的認同。」(Gerber and Green 1998:795)

這兩種互相對立的理論何者較為正確？其爭論的焦點顯然是政黨認同的穩定性。如果政黨認同如原始密西根理論所設想的，是選民對政黨的心理和感情依附，那麼它應該是長期穩定的。如果政黨認同所反映的只是對政黨和其領導人的表現的評價，那麼它就應該是短期變動的。這項爭論只能以實證資料解決。實證資料到底支持哪一個理論？

不少研究都曾經指出，政見立場、經濟情況、甚至對總統候選人的支持等，都可能改變政黨認同(如Mackuen et al. 1989)。可是改變的幅度有多大？而且長期而言，政黨認同在選民身上是否維持長期性的穩定？這些問題都只能由對固定樣本的追蹤訪問研究所獲得的資料來回答，因為受訪者可能傾向於隱瞞其認同改變的事實。最近幾個以固定樣本追蹤訪問調查的資料所做的研究，對這個爭論提供了幾乎是結論性的答案。Schickler & Green(1997)根據在英國、德國、和加拿大三個國家所做的八個固定樣本追蹤訪問調查資料指出：這三個民主國家選民的政黨認同都沒有因為短期的因素(對領導者和政黨表現的評價，如失業率、通貨膨脹等)，而有所改變。他們同時也發現，這三個國家選民的政黨認同都歷經長時期仍能維持高度的穩定。此外，Green & Palmquist(1994)根據九個追蹤訪問調查、每一個調查都至少有三波訪問的資料也指出：美國選民的政黨認同並沒有因為戲劇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過程而改變，如越戰、水門事件、雷根時代等。相反的，其政黨認同維持著高程度的穩定性。其他類似以追蹤訪問調查資料所做的研究也都指出，政黨認同是所有政治態度中最為穩定者(Jenning and Niemi 1981)。至目前為止，實證的資料堅強地支持了密西根模型原始的理論立場。(對政黨認同這兩個對立理論的論爭之回顧，請參閱Gerber and Green 1998。)

如果政黨認同是一個長期穩定的心理現象，那麼這個態度是如何形成的？密西根模型的回答是：家庭社會化。這是密西根模型中另一個重要的理論內涵。就像宗教認同一樣，美國的選民從小在家庭中繼承了父代的政黨認同。這種父母和子女之間的世代傳遞現象，也充分說明政黨認同所立基的非政治性社會心理基礎。不少研究指出，美國選民在孩提時代就發展出政黨認同。例如Greenstein對New Heaven地區學童的研究發現：到小學四年級的時候，已經有六成的學童可以說出，他們比較喜歡共和黨還是民主黨(1965:71)。Easton and Hess對七百位學童的研究也發現：從二年級到八年級中的每一個年級中，都有大多數的學童說，假設他們能投票他們會支持兩個政黨中的某一個黨(摘自Dennis and McCrone 1970:249-250)。為何美國選民如此早期就發展出政黨認同？唯一的解釋似乎是家庭的影響。後來的研究者對父母代和子女代所做的「分別」訪問調查研究，而非以子代的回憶資料為基礎的研究，也証明了父母所傳遞的政黨認同在子女身上的作用。隨著子女的成長、社會地位的流動、以及政見立場的出現，父母所傳遞的政黨認同的影響力雖然下降，可是仍然極為顯著。這個影響力甚至可以通過七O年代「政黨解組」的考驗(Niemi and Jennnings 1991)。

當然，這種家庭社會化並不是形塑政黨認同的唯一因素。事實上，政黨認同的根源到底為何，也是美國選舉研究中的重要爭論之一。除了上面所提到的，成年後的社會位置(如就業、婚姻、社區)會影響幼年形塑的政黨認同外，有人認為：政黨認同不但會影響政見立場，政見立場反過來也會影響政黨認同。也就是說，政

黨認同不只是一個長期的、家庭社會化的結果，也可能由短期的、政治性考慮所形塑(Jackson 1975)。另外一個較符合社會化觀點的研究和論點是：青少年高中時期同儕團體的影響(Jennings & Niemi 1974)。在形成政黨認同的長久過程中，無論其影響因素是什麼，「對許多人而言，政黨認同是一個長期而持續的特質，它從生命的早期開始一直持續到晚年。」密西根模型原始作者之一的Miller在回顧過去四十年有關政黨認同的研究和爭論後，這樣結論道(Miller 1996:132)。

如果家庭的社會化是政黨認同最重要的來源，那麼父母代的政黨支持由何而來？對這個問題的提出和回答，是<<美國選民>>一書的作者們，對美國政治發展研究的另一重要貢獻。一九四八到一九五六年期間(該書的訪問調查時期)，美國選民的父母代如何形成對政黨的支持，而將這樣的支持過繼給他們的子女，形成後者的認同？該書的作者們認為，這主要是來自美國近代政治史上最重要的兩個關鍵時期和事件：內戰及經濟恐慌。不同政黨在這兩個時期，因不同的政策立場而形成新的社會支持，改變了美國政黨的政治版圖。「在一世紀之後的今天，美國選民政黨依附的地區分配，仍然和當時所形成的一致。」(152)而政治版圖可以歷經百年的穩定和一致，正是透過家庭社會化對政黨認同的形塑力量。正如V. O. Key的觀察，選民對政黨的連繫具有可觀的持續力，在「創造政黨連繫的議題消失之後」很久的時間內，仍然可以維繫不墜(152)。第二個改變選民政黨支持及政黨版圖的危機事件，是經濟恐慌和隨後的新政。民主黨的新政「深深地改變了[美國選民的]政黨立場(political partisanship)的方向。」(160)

這樣的理論視野對我們研究新世代的政黨認同，應有甚大的啟發性。當民主或威權的分歧(甚至統一或獨立的分歧)，在政治領域中逐漸不再是重要的議題，當選民逐漸不再以對這些議題的立場決定對政黨的支持的時候，上一代因意識型態的分岐所形成的政黨支持，可能透過家庭社會化形塑新世代選民的「政黨認同」，也因而維持了政黨勢力的穩定。這是本文的論點。

由於密西根模型在投票行為理論上的突破、其「政黨認同」變項對投票行為的解釋力，它不但迅速成為投票行為理論的典範，而且被其他許多國家的研究者所複製。可是不同國家具有不同的政治情況和不同的政黨體系，這種複製在測量政黨認同上經常面臨難題。密西根研究最早採用測量政黨認同的方式是，詢問受訪者:「一般而言，你認為自己是一個Republican、Democrat、獨立選民(Independent)，或其他？」回答是Republican或Democrat的受訪者，則繼續追問其強度。而回答是獨立選民的受訪者，則繼續追問：「你認為自己比較接近共和黨或民主黨？」(Campbell et al. 1976:122)英國的研究者最先亦使用相同的詢問方式：「你認為自己是一個Conservative, Liberal, 或Labor？」德國的研究者則使用如下的測量方式：「你認為自己是CDU/CSU的擁護者(adherent)，還是FDP的擁護者，NDP的擁護者，還是其他政黨的擁護者，或者你並沒有特別依附(attached)某一政黨？」以這樣的詢問方式，德國的選民受訪者中有54%認為自己是某一政黨的擁護者。後來的研究改用「支持者」(supporter)的問法，同時不提政黨的名稱，則對政黨有所認同的比例下降至29%(Kaase 1976:86)。

正如幾乎所有主觀態度的測量一樣，以不同的文語來測量政黨認同確實會導致比例上的變化。同時以密西根研究的原始方式和新的不同的詢問方式，在美國對同一群受訪者做比較的實驗，也發現不同的結果。研究者以「接近政黨」來測量政黨認同：「你通常感覺比較接近哪一個政黨？」對回答接近某一政黨的受訪者，

則續問：「你會說你非常接近、還算接近、或是不很接近那個政黨？」這種詢問方式的結果，和密西根研究的原始詢問方式比較，有更高比例的受訪者具有政黨認同。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主要的差異發生在「獨立者」的類別。在原始詢問方式中具有「政黨認同」的受訪者，在新的詢問方式中同樣回答接近相同的政黨。可是許多原始詢問方式中的「獨立」受訪者，在新的詢問方式中卻回答了對某「政黨的接近」(Barnes et al. 1988)。另外一個在加拿大做的實驗研究也指出同樣的現象。該研究試圖指出，美國和歐洲國家的選民在政黨認同現象上的差異，主要是在詢問時文語的差異所造成的(Johnston 1992)。

在臺灣測量政黨認同所遭遇的第一個難題也是文語選擇的問題。在臺灣的政治環境和中文語言中，如何找到一個和原始測量「政黨認同」的文語所對等的詞彙，一直是一個困難的工作。在英文中，「我是一個Democrat」，「你是否自認為一個Republican？」都有很清楚簡單的意義。這樣的說法和問法，不會被誤會為是在指涉正式的黨員身份。而且，在美國的政黨體制和政治環境中下，「政黨機器」並不是一個顯著而重要的政治組織。當我們談到共和黨或民主黨的時候，我們很少是在指一個有形的、在政治職位和權力的分配上具有重要功能、有正式組織、有正式黨員、有權力分配和日常運作的規章的黨機器。不論是在地方基層或全國政治舞台上，政黨都比較是一群自我認同者的集合。美國特殊的聯邦制度和地方分權，又強化了這個現象。當一個人說他是一個Democrat的時候，他很清楚地是在指個人對政治群體歸屬的自我認定；他是屬於這樣一群人的一份子。在這樣的政治和政黨環境中，這樣的問法適足以表示出這樣的主觀認同。

可是在臺灣卻很難有適當的語言表達這種主觀認同。詢問一個人「是國民黨的，還是民進黨的」，不但在文法上非常奇怪，也會被誤以為是在問黨員身份。因此，臺灣的研究者嘗試了數種方式，試圖測量臺灣選民的政黨認同。(針對此問題的最近討論，參見何思因、吳釗燮 1996)。胡佛教授領導的臺灣大學「政治體系與變遷研究工作室」，在過去十多年的每一個全國性選舉後，都做了有關投票行為研究的訪問調查。最近幾年的研究也不斷地對「政黨認同」的測量做嘗試。最早的嘗試是在1989年的立法委員選舉，以是否喜歡國民黨、民進黨**同時**詢問受訪者。其詢問方式是這樣的：「在我們的社會裡，有很多人喜歡國民黨，也有很多人不喜歡國民黨；有很多人喜歡民進黨，也有很多人不喜歡民進黨；當然，也有很多人可能對這兩個政黨的感覺都差不多，而無任何的偏好。請問：你及你的家人對這兩個政黨偏愛的程度是怎樣的？」回答對兩黨都喜歡的受訪者，繼續追問：「剛才你表示喜歡國民黨，也喜歡民進黨。在兩黨比較之下，請問：你究竟較偏愛那一個政黨？」回答對兩黨都不喜歡的受訪者，則繼續追問比較不喜歡那一個政黨。

這種測量政黨認同方式的優點是，它不但測量了選民對政黨正面的喜歡，也測量了他們對另一政黨負面的不喜歡。我們知道，決定選民投票行為的變數，有時候並不是對某一政黨／候選人的正面支持或正面印象，而是對另一政黨／候選人的負面敵視或負面印象。在三個以上的政黨或候選人互相競爭的情況下，這種對其中某一政黨或候選人的負面性敵意，對選民投票策略的理解也有很大幫助。第二個優點是，它可以測量到對兩個(以上)政黨的同時喜歡。有人認為，同時對兩個政黨有所認同是可能的，可是至目前為止似乎仍然沒有人對這種多重認同的現象做仔細的討論(Knight 1984)。

可是將「喜歡」當成「政黨認同」的指標卻值得商榷。因為「喜歡」和「認同」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和現象。喜歡一個政黨和認同或支持一個政黨，雖然可能高度相關，可是在心理上和政治意義上都是不同的現象。對政黨的喜歡比較可能受到短期的政黨形象或政策主張的影響。而政黨認同應該是較長期穩定的現象。正如Converse and Pierce(1985)所指出的，用「喜歡」來作為政黨認同的指標並不恰當。因為原始的政黨認同概念中有兩個重要元素。一是時間的向度：認同指的是較長期的態度。這個時間向度在原始的測量中，以「一般而言」的字眼來指涉。第二個元素是(對某群體的)自我認同。這個元素用「認為自己是…」的字眼來指涉。可是「政黨喜歡」卻缺少這兩個基本元素。它比較像是對政黨的「滿意度」(approval)，而非自我認同。同時也缺少時間的向度：問的是「此時」的喜歡。

測量政黨認同的第二個嘗試是1991年的國大代表選舉。在那次的訪問調查中，研究小組以另一種方式取代上述的測量方式：「目前國內有兩個主要政黨，一個是國民黨，另一個是民進黨，請問在感情上您比較傾向接受那個政黨？」有政黨傾向者續問其強度，回答「不偏向那一個政黨者」則不續問。以這種詢問方式測量「政黨認同」的原因是，「政黨認同」的原始意義隱含著選民對同一群體的情感性依附。在無法找到和原始測量對等字眼的情況下，直接用認同所隱含的感情傾向來取代。這種詢問方式並沒有解決上一測量方式的難題；「感情接受」主要仍然是主體的「我」去接受客體的「政黨」的概念。它並沒有包含「自我歸屬」(belonging)這個認同的核心概念。而且，在中國社會詢問一個人對某一政黨是否「有感情」，似乎讓人覺得有些奇怪。儘管如此，就政黨認同的測量實驗而言，它比以前進了一步；因為它試圖分辨：政黨支持中「感情的依附」和「理性的政治考慮」兩個不同的面向。

該研究小組測量政黨認同的第三個嘗試，是在1994年的省市長選舉調查中，使用「政黨支持者」的概念：「在臺灣有人是國民黨的支持者，也有人是民進黨的支持者，也有人是新黨的支持者，請問您覺得自己是那一個政黨的支持者？」「支持者」的概念和「認同」是不一樣的。密西根的全國選舉研究中心在1980年也嘗試了用「支持者」的概念，來測量政黨認同：「在你心中，你是否覺得自己是某一政黨的支持者？」結果有三成的受訪者回答他們不是任何政黨的支持者，其比例是原始詢問方式中「獨立者」的兩倍(Barnes et al. 1988)。支持者的概念大為降低了政黨認同者的比例。

雖然「支持」的概念距離原始模型中的「認同」仍有一段距離，不過在沒有其他更好的測量方式下，這似乎是唯一的選擇。而且，在台灣的政治環境下，這樣的問法或許更能顯示政黨依附的內涵。台灣政治中的意識型態分岐以及政黨在這些分岐上的代表性，使得台灣選民對政黨的依附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意識型態為基礎。支持的概念恰足以顯示此種理性考慮的面相。而更重要的，如果我們的目標不是做跨國的比較，而是分析政黨依附在台灣政治發展不同階段中的變化，以「支持」作為「政黨認同」的指標，或許是可以接受的方法。以下，我們將用這個測量方式分析台灣不同世代選民的政黨認同的變化。

二、「政黨認同」的世代差異

首先讓我們以1996和1998兩年的資料，對政黨認同在台灣選民中的分佈做約略的觀察。雖然研究小組在1994年的省市長選舉調查中，就嘗試以「支持者」的詢問方式測量政黨認同，可是第一次有全國性的樣本卻是在1995立法委員和1996年總統選舉之後的訪問調查。兩次訪問調查時間都在1996年4月。因此我們只用後一個調查的資料。以上兩次調查詢問政黨認同的方式，和上述1994年調查的詢問方式都有大幅度的改變：「…有些人會堅定不移的站在某一政黨的這一邊，自認為是這個黨的忠誠支持者或忠誠黨員，請問您的情況怎麼樣？」諸如「堅定不移」和「忠誠」等強烈的語氣，必然大為降低政黨支持的比例。1998年的資料則是「台灣社會變遷政治文化訪問調查」(訪問調查期間是該年6-8月)。在這項全國性的研究調查中，我們恢復原先的政黨認同詢問方式：不加上「堅定不移」和「忠誠」等字眼，而只問是否為「支持者」。這是我們在比較兩年的資料時必須注意的。除此之外，由於新黨認同者在1998年的數目過少，我們將不加以討論。

首先讓我們檢視具有政黨偏好者(partisans)在選民中的比例。如果將(忠誠)支持者和「偏向者」都視為有政黨偏好者，有政黨偏好者在選民中的比例大約六成。而沒有政黨偏好的「獨立選民」在兩年中的比例，也大約四成。而且每一個年齡層都有大約相同的比例屬於獨立選民。新世代並沒有比其他高年齡層的選民更傾向於成為獨立選民。媒體上所流行的，認為新世代選民比較少政黨偏好的看法，並沒有受到實證資料的支持(參見表一)。

如果我們檢視政黨偏好在這兩年的變化，我們發現：偏好國民黨的選民和獨立選民的比例，這兩年並沒有太大的變化。比較可觀察到的變化是在民進黨和新黨的偏好者。過去兩年間，偏好民進黨的比例從16.8%成長到22.2%；而偏好新黨的比例卻從10.0%下降到4.1%。

其次，讓我們觀察年齡和政黨偏好的關係。在這個面向上，國民黨和民進黨有相當大的差異。民進黨的認同者和年齡呈負相關。高年齡層中，偏好民進黨的比例是18.0%，中年齡層是22.2%，而新世代則是28.8%。而偏好國民黨者在年齡的分佈上，卻有相反的趨勢。中、高年齡層偏好國民黨的比例都有三成五以上。可是在新世代中，偏好國民黨的比例卻下降至二成五。成長於自由化和民主化階段、沒有體驗過國民黨的白色恐怖經驗的新世代選民，反而比年長者更少支持國民黨。整體而言，國民黨相對於民進黨在政黨支持上享有的絕對優勢。可是因為

上述的相反趨勢，卻使得國民黨在新世代選民中和民進黨平分秋色。在新世代中，偏好國民黨的比例是25.9%，而偏好民進黨的比例是28.8%。一般流行的「新世代比較支持民進黨」的說法，事實上並不是一項精確的描述。更精確的說法應該是：相對於中、高年齡的選民，新世代的選民中有更高的比例偏好民進黨；可是在新世代的選民中，兩黨的勢力大致上是相等的。

然而本文最關心的，還是台灣選民政黨支持的基礎及其變化。更具體地說，我們的目標是了解：隨著政治局面的巨變，台灣選民，特別是新世代的選民，其政黨認同的基礎是否也有所改變？以下的分析和討論，將以 1998 年「社會變遷政治文化訪問調查」所獲得的樣本資料為基礎。該樣本是至目前為止，同時包括父代政黨認同的唯一全國性樣本。在以下的分析中，我們將只選擇自認為某「政黨支

表 1 政黨認同與年齡，1996,1998*

Row		20/19-30 (忠誠)	偏向	31-45 (忠誠)	偏向	46- (忠誠)	偏向	Total (N) (忠誠)	偏向	政黨偏好
Column		支持者		支持者		支持者		支持者		
國民黨	96	6.7	13.3	19.6	18.0	26.1	16.4	17.7	+16.2 =	33.9 (451)
		8.7	17.5	16.3	15.0	26.4	16.6			
	98	9.7	6.8	32.8	13.9	31.8	5.2	25.5	+ 8.9 =	34.4 (601)
		15.2	10.7	25.0	10.5	33.0	5.4			
民進黨	96	10.3	20.1	21.0	26.3	10.3	12.1	7.0	+ 9.8 =	16.8 (214)
		6.7	13.1	8.7	10.9	5.1	6.0			
	98	16.2	12.1	32.7	12.3	19.0	7.7	15.1	+ 7.1=	22.1 (389)
		16.5	12.3	16.1	6.1	12.8	5.2			
新黨	96	12.0	28.4	17.2	25.4	6.0	11.2	3.5	+ 6.5 =	10.0 (134)
		4.7	11.1	4.3	6.3	1.8	3.4			
	98	8.3	16.7	36.1	15.3	16.7	6.9	2.5	+ 1.6 =	4.1 (72)
		1.6	3.1	3.3	1.4	2.1	.9			
獨立選民	96	25.1		39.9		34.9				39.2 (521)
		38.2		38.5		40.7				
	98	22.6		43.2		34.2				39.3 (687)
		40.6		37.6		40.7				
Total	96	25.8 (343)		40.6 (540)		33.6 (447)				100 (1330)
	98	21.8 (382)		45.1 (789)		33.0 (578)				99.9 (1749)

*這兩年的訪問調查研究，詢問政黨認同的文句有稍微的不同。1996 年是：「目前國內有三個常聽到的政黨…這三個政黨各有各的歷史、理念與精神，因此各有各的支持者。有些人會堅定的站在某一政黨的這一邊，自認爲是這個政黨的忠誠支持者或忠誠黨員，請問您的情況怎麼樣？」1998 年則是：「在臺灣有人是國民黨的支持者，也有人是民進黨的支持者，也有人是新黨的支持者，請問您覺得自己是那一個政黨的支持者？」

持者」的受訪者為該政黨的認同者。回答「不是任何政黨支持者」的受訪者，則定義為「獨立選民」。以下我們將以這樣的測量方式，分析新政治世代的政黨認同。

過去對台灣政黨認同的研究都發現，民主態度和民族認同等意識型態是政黨認同的重要分界線。民進黨的支持者在民族認同、民主態度上，都表現出極為顯著的特徵：較傾向台灣民族主義，同時也有較高的民主態度；而國民黨的支持者則比較傾向於中國民族主義、民主態度比較低(吳乃德 1993，1995)。這和民進黨反威權體制、主張台灣獨立的政治主張一致。也就是說，兩黨的支持者對政黨的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政治立場」。可是這種基於政治意識型態的政黨認同，是否也存在於新的政治世代身上？在了解新世代選民政黨認同的基礎是否有所變化時，讓我們首先檢視這些意識型態和政黨認同的關係。

如表二所示，當我們將全體受訪者的民主態度和政黨認同加以聯列觀察時，我們發現：即使在民主轉型已經過了十數年之後，兩者仍然有相當顯著的相關性。民進黨的認同者比國民黨的認同者較傾向於抱持民主理念。可是如果我們將樣本分成三個不同的年齡層來觀察，我們立刻發現：這個相關性主要是發生在高年齡層的受訪者中。在高年齡層中，民進黨的認同者將近一半(49.3%)屬於高度民主態度者；國民黨的認同者中屬於高度民主態度取向者，卻只有兩成左右(21.1%)，另外有將近一半屬於低民主分數群。可是在新政治世代中，兩黨認同者在民主態度上的如此顯著的差異卻不可見。在新世代選民當中，國民黨認同者和民進黨認同者，在民主態度分數上的分配上差距不大。甚至連獨立選民在民主

態度的分配上，也和兩群政黨認同者差異不大。在新世代中，民主價值顯然不能解釋為什麼他們之中有些人有政黨認同，有些人成為獨立選民，以及有政黨認同的人會認同不一樣的政黨。

表2　政黨認同，民主態度與年齡，1998*

a) %

	民主態度*			Total (N)
Row	低	中	高	
國民黨	34.4	32.8	32.8	25.7 (439)
民進黨	20.5	29.0	50.6	15.2 (259)
新黨	18.2	27.3	54.5	2.6 (44)
獨立選民	30.4	30.0	39.6	56.6 (967)
(N)	29.6 (506)	30.5 (521)	39.9 (682)	100 (1709)

Chi-Square=29.38958, DF=6, Sig.<.001

b) %

		民主態度			
		低	中	高	Total (N)
19-30	國民黨	20.7	31.0	48.3	15.3 (58)
	民進黨	14.3	33.3	52.4	16.7 (63)
	新黨	33.3	16.7	50.5	1.6 (6)
	獨立選民	20.3	29.5	50.2	66.4(251)
Chi-Square=2.31581, DF=6, Sig.=.88849					
31-45	國民黨	27.0	33.7	39.3	25.2(196)
	民進黨	20.8	28.8	50.4	16.0(125)
	新黨	15.4	23.1	61.5	3.3 (26)
	獨立選民	23.4	32.6	44.0	55.5(432)
Chi-Square=7.32745, DF=6, Sig.=.29162					
46 -	國民黨	46.5	32.4	21.1	185 (33.5)
	民進黨	25.4	25.4	49.3	71 (12.9)
	新黨	16.7	41.7	41.7	12 (2.2)
	獨立選民	50.0	26.4	23.6	284 (51.4)
Chi-Square=30.27337, DF=6, Sig.<.001					

*民主態度的測量題目:
1. 政府的決定只要對人民有利就好，不一定要得到大多數人的同意 2. 對付殘暴的犯人應該馬上處罰，不必等待緩慢的法院審判 3. 一種言論或意見，可不可以在社會上公開流傳，應該讓政府來決定 4. 以這幾年的政治情況來看，台灣並不適合實施民主政治 5. 政府如果常常受到民意機關的牽制，就不可能有所作爲了 6. 一個政黨不管它的主張是什麼，只要它贏得選舉，我們就要接受它 7. 國家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應該聽從中央政府首長的決定 8. 在地方上，如果有許多不同意見的團體，就會影響到地方的安定。
非常同意 1 分；同意 2 分； 不同意 3 分； 非常不同意 4 分；無意見 0 分。第 6 題反向。
高民主態度:20-30(30.6%); 中民主態度:18-19(30.2%); 低民主態度: 0-17(39.2%)。

如果民主態度不能解釋新政治世代在政黨認同上的差異，過去研究所發現的族群認同和民族認同，是否能解釋這項差異？如果我們檢視政黨認同和族群認同的關係，我們發現和上述民主態度類似的現象。如表三所示，整體而言，族群認同和政黨認同仍然有很顯著的相關性。可是這樣的相關性，同樣也主要是作用在高年齡層的選民中。新世代選民是否有政黨認同，而如果有認同的話，他們認同哪一個政黨，這些都和族群認同沒有太大的關係。族群認同同樣不能解釋新世代的政黨認同傾向。

民族認同和政黨認同的關係，也有相同的樣態。整體而言，兩者仍然有顯著的相關性。可是這樣的相關性同樣也是來自高年齡層的選民。由於外在政治環境和中國對台灣態度的變化，台灣民眾的民族認同在這幾年有劇烈的轉變。台灣民族主義者在全人口中的比例，由1993年的10.3%、1996年的21.3%驟升至1998年的41.1%。而中國民族主義者則由1992年的38.0%、1993年的27.6%、1996年的16.9%，在1998年降至10.9%。[2]即使經過這麼劇烈的變化，民族認同和政黨認同的關係，在高年齡層中仍然相當顯著。可是在新世代中，民族認同和不同的政黨認同、獨立選民等的關係都不顯著，雖然民進黨的認同者仍然比國民黨稍微傾向台灣民族主義（參見表四）。

表 3 政黨認同，族群認同與年齡，1998

a) %

Row	族群認同			
	台灣人	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中國人	Total (N)
國民黨	29.3	53.5	17.2	25.6 (437)
民進黨	63.4	31.3	5.3	15.3 (262)
新黨	2.3	72.1	25.6	2.5 (43)
獨立選民	42.1	48.9	9.0	56.6 (966)
Total (N)	41.1 (702)	48.0 (819)	10.9 (187)	100 (1708)

Chi-Squre=120.45998, DF=6, Sig.<.001

[2] 民族主義態度的測量，是以受訪者對下列兩個問題的回答交叉分析構成：「如果中國和台灣在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面的條件都相當接近的時候，您是不是贊成台灣和大陸統一？」「如果台灣宣佈獨立之後，仍然可以和中國大陸維持和平的關係，請問您贊不贊成台灣獨立的主張？」贊成第一個問題，反對第二個問題的受訪者歸類爲中國民族主義者。反對第一個問題，贊成第二個問題的受訪者歸類爲台灣民族主義者。對此項測量方式的詳細討論，請參見吳乃德(1993)。有關前幾年的數據，請參閱 Wu(1997)。

b) %

		族群認同			
		台灣人	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中國人	Total (N)
19-30	國民黨	36.2	51.7	12.1	15.4 (58)
	民進黨	47.6	42.9	9.5	16.8 (63)
	新黨		60.0	40.0	1.6 (6)
	獨立選民	34.8	54.0	11.2	66.5(250)
Chi-Square=9.20173, DF=6, Sig.=.16255					
31-45	國民黨	23.4	60.4	16.2	25.2(197)
	民進黨	63.0	32.3	4.7	16.3(127)
	新黨		73.1	26.9	3.3 (26)
	獨立選民	37.1	53.1	9.7	55.2(431)
Chi-Square=73.43345, DF=6, Sig.<.001					
46以上	國民黨	33.5	46.7	63.2	33.0(182)
	民進黨	77.8	19.4	2.8	13.1 (72)
	新黨	8.3	75.0	16.7	2.2 (12)
	獨立選民	56.1	37.9	6.0	51.7(285)
Chi-Square=66.27473, DF=6, Sig.<.001					

如果在新世代的選民當中，國民黨的認同者、民進黨的認同者、以及獨立選民這三群民眾，在上述的幾個重要意識型態都沒有太大的差異，那麼造成這些不同的政黨依附的力量是什麼？在意識型態的分岐逐漸消逝的新政治環境中，家庭社會化這個美國選民政黨認同形成的重要力量，是否也作用於台灣新世代的選民中？這是我們以下的工作。

我們在第一部份的討論中指出，經過數十年的批評、辯證、新證據的搜尋、和舊資料的再分析，傳統密西根模型一個重要論點仍然迄立：家庭社會化是美國選民政黨認同形成的最重要基礎。密西根模型提出的時候，也正是美國政治學中政治社會化研究的高潮期。文化價值是人類行為中的重要面向。人類行為不單只是對相同刺激的相同反應，也不單只受到普遍性的理性選擇所決定。如果人類行為受到不同的文化價值所影響，那麼人必定在某些社會場域、向某些對象學習這些文化價值(Eckstein 1988)。而另一方面，以David Easton為代表的系統理論也正流行。在其理論視野下，政治體系的穩定和生存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政治社會化研

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意識即是：政治體系如何將現存的價值，繼續傳遞至下一代，以維持政治體系的生存。這是當時政治社會化研究的重要目標(Nathan & Remy 1977)。在這樣的問題意識和研究目標下，家庭社會化的重要性不言可喻。政治體系的重要價值，如民主、權威等態度，是透過家庭社會化而傳遞給下一代的政治公民，因而維持了民主政治體系的生存。然而曾經蓬勃發展的政治社會化研究，卻在七０年代急速衰退。第一項原因是，政治學者不再執迷於體系的穩定和生存、這個既保守又抽象的問題意識。第二，後來的許多研究指出，從兒童收集到的有關政治態度的訪問資料非常不可靠。而且，兒童的政治態度也經常在改變(Conover 1991)。這些研究發現雖然摧毀了家庭政治社會化的理論，可是它們同時也發現一個重要的現象：兒童的政治態度中，唯一不改變的是政黨認同。雖然兒童成年之後有可能改變他們的政黨認同，可是基本上從家庭中習得的政黨認同在長期上是保持穩定的趨勢(Jennings & Niemi 1981)。在政治社會化研究沒落之後，這些發現使得政黨認同的家庭社會化理論仍然存活。

表 4 政黨認同，民族認同與年齡，1998

a) %

	民族認同			
	台灣民族主義	現實主義	中國民族主義	Total (N)
Row Col.				
國民黨	23.3	44.7	32.0	25.6 (437)
民進黨	47.2	45.4	7.4	15.3 (262)
新黨	4.9	46.3	48.8	2.5 (43)
獨立選民	28.1	50.7	21.1	56.6 (966)
Total (N)	41.1(702)	48.0 (819)	10.9 (187)	100 (1708)

Chi-Squre=89.97713, DF=6, Sig.<.001

b) %

		民族認同			
		台灣民族主義	現實主義	中國民族主義	Total (N)
19-30	國民黨	30.2	39.5	30.2	15.5 (43)
	民進黨	38.9	46.3	14.8	19.4 (54)
	新黨		60.0	40.0	1.8 (5)
	獨立選民	29.0	40.3	30.7	63.3(176)
Chi-Square=7.87348, DF=6, Sig.=.24752					
31-45	國民黨	17.5	49.4	33.1	25.2(160)
	民進黨	43.0	50.9	6.1	18.0(114)
	新黨	4.0	48.0	48.0	3.9 (25)
	獨立選民	24.8	56.7	18.5	52.8(335)
Chi-Square=56.45660, DF=6, Sig.<.001					
46以上	國民黨	27.8	41.0	31.3	36.8(144)
	民進黨	62.3	34.4	3.3	15.6 (61)
	新黨	9.1	36.4	54.5	2.8 (11)
	獨立選民	33.7	49.7	16.6	44.8(175)
Chi-Square=44.08353, DF=6, Sig.<.001					

為何家庭，也就是父母親，在子女政治態度的形塑上，會發生作用？原因或許不難理解。子女在生活上、經濟上、和感情上對父母的完全依賴，使得子女很難抵抗要和父母一致的力量。同時，子女和父母都處於相同的社會位置，具有相同的階級、族群、和社區等背景。這個社會背景的相似性，使得父代主觀的政黨認同不會和子代客觀的政治環境有所衝突，因而導致子代認同的改變(Dalton 1980)。可是為什麼在所有的政治態度中，只有政黨認同的傳遞容易成功，其他的政治態度則看不到父代的傳遞效果？最重要的原因或許是，父母比較少在家庭中對子談論具體的公共政策和政治議題。父母對子女的影響主要是一般性的政治態度和政治傾向。Beck and Jennings因此試圖將其對家庭社會化研究的焦點集中於「政治興趣」(attention to politics)和「政黨忠誠」。因為它們「是民主政治中公民參與最重要的面相。」(1991:745)。結果他們發現：父代的政治興趣對子女的政治興趣只有中度的影響；可是父代的政黨認同卻非常顯著地傳遞給下一代。而且更重要的，父代的政治興趣，顯著加強了家庭社會化效果。「對政治生活持高度關注和參與的父母，顯著加強了其政黨認同對子女的傳遞，同時也讓其子女的政黨認同在成年後較少改變。」(751)這個發現對家庭社會化的理論有重要的意涵。它

顯示父代的傳遞效果是否存在，當它存在的時候其強度如何，都受到家庭政治氣氛的影響。這在我們解釋台灣兩黨選民的政黨認同對其子代傳遞效果的差異上，或許有所啟示。而另一方面，父代政黨認同傳遞於子代的差異，不只存在於同一社會中的不同家庭，也存在於不同的社會。這項不同社會中的差異，可能也解釋了具有政黨偏好的選民中在不同社會中的比例。Converse and Dupeux的研究指出，法國選民中只有28%的民眾知道其父代的政黨認同；相較而言，美國選民中卻有82%可以說出其父代的政黨認同。這或許是法國選民中只有45%有政黨偏好，而美國選民中政黨偏好的比例高達75%的重要原因(Dennis & McCrone 1970:45)。

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的父代傳遞效果如何？家庭社會化是否解釋了新世代的政黨偏好？家庭社會化對政黨認同之形塑效果的最直接證據，應該是子代和父代之間政黨支持的一致性或岐異性。事實上，這項資料也是美國研究政黨認同的學者，用來支持其理論最重要的依據。在以下的分析中，我們所用的父代政黨認同的資料，將以由受訪者(子代)所報告的為依據。當然，受訪者所報告的父代政黨支持或許會有所偏差；子代可能會傾向於曲解父代的政黨支持，以符合自己的偏好。這是難以避免的難題。因此最好的研究策略應該是對子代和父代分別做訪問。可是，我們目前卻缺乏這樣的資料。而且在可見的將來，我們也不可能獲得對父代和子代分別訪問的資料。儘管我們的資料有這樣的缺陷，可是也非完全不能信賴。第一，美國的研究經驗顯示：當研究者對父代和子代的政黨認同做分開訪問，其結果和由子代所報告的父代政黨認同相差並不遠。子代的報告並沒有太大的扭曲(Niemi and Jennings 1991)。子代所提供的資料大致上是可信的。其次，如果(台灣的)受訪者所報告的資料有所偏差的話，這樣的扭曲和偏差應該出現在所有年齡層、所有政黨認同的受訪者身上，而非某一特定年齡層和某一特定政黨認同者的特殊現象。可是正如以下的資料所顯示的，子代和父代政黨認同的一致性在不同的年齡層和不同政黨的支持者中，表現出甚大的差異。兩代之間的一致性顯然不是受訪者一廂情願的想法。這些都讓我們對受訪者所提供的父代資料有某種程度的信賴。

表五是對受訪者和其父親的政黨支持所做的交叉分析。我們可以從該表中清楚地看到：在新政治世代中，國民黨的認同者和民進黨的認同者都和父代的政黨支持，有相當高的重疊性。新世代的民進黨認同者中，有65.1%來自民進黨支持者的家庭。而國民黨的認同者中，也有55.2%是來自國民黨支持者的家庭。在上面的分析中，我們曾經發現：在新世代的選民中，台灣的政治意識型態分岐和認同的分岐，和其政黨認同並沒有顯著的關係。如今我們則發現：父代政黨支持和政黨認同之間的顯著關連。結合這兩項發現，我們很難不得到這樣的結論：在新政治世代政黨認同的形成上，家庭社會化是最重要的力量之一。洛基迴歸模型的分析也支持了以上的發現和結論。在解釋新世代對國民黨的認同中，父親的國民黨支持(家庭社會化)是唯一的變項。新世代的國民黨認同和性別、教育水準、省籍、民主態度、族群認同、民族認同等，都無顯著的關係。而在解釋新世代對民進黨的支持中，父親的民進黨支持(家庭社會化)也是最顯著有預測能力的變項之一(參見附錄)。

表 5 父代與子代的政黨認同，1998

		父親的政黨認同				
	Row Column	國民黨	民進黨	獨立選民	不知道	Total (N)
19-30	國民黨	55.2	17.2	19.0	8.6	15.3 (58)
		30.5	9.3	7.7	20.0	
	民進黨	11.1	65.1	20.6	3.2	16.6 (63)
		6.7	38.3	9.1	8.0	
	新黨	83.3		16.7		1.6 (6)
		4.8		.7		
	獨立選民	24.1	22.1	46.6	7.1	67.6 (253)
		58.1	52.3	82.5	72.0	
31-45	國民黨	57.9	8.6	24.4	9.1	26.0 (197)
		41.9	14.2	15.1	24.3	
	民進黨	17.3	39.4	29.9	13.4	16.8 (127)
		8.1	41.7	11.9	23.0	
	新黨	61.5	19.2	15.4	3.8	3.3 (26)
		5.9	4.2	1.3	1.4	
	獨立選民	27.6	11.1	52.5	8.8	57.3 (434)
		44.1	40.0	71.7	51.4	
46-	國民黨	35.8	2.6	43.7	17.9	33.9 (190)
		53.1	14.3	26.2	37.0	
	民進黨	9.6	23.3	50.7	16.4	13.0 (73)
		5.5	48.6	11.7	13.0	
	新黨	45.5		45.5	9.1	1.9 (11)
		3.9		1.6	1.1	
	獨立選民	16.1	4.4	64.4	15.1	53.1 (298)
	Total	37.5	37.1	60.6	48.9	

至於中年齡層國民黨的認同者和父代的高度一致性，是否能解釋為家庭社會化的

效果？我們並不傾向於做這樣的解釋。在比較高年齡的選民成長的階段中，國民黨是唯一的政黨，而且代表著正統的、主流的意識型態。在那樣的時代中，大多數的國民，不分男女老幼，都在這個意識型態的氣氛下成長，並且也在宣揚此種意識型態的教育系統中接受教育。在這種情況下，兩代之間對國民黨的一致支持，不一定是家庭社會化的結果。我們先前所提供的資料，也顯示在較高的年齡層中，意識型態的分岐顯著解釋了政黨認同的歧異。中高年齡層的國民黨認同者，顯著地較傾向於中國認同和低度的民主態度。此種因意識型態對政黨認同的影響力，在中高年齡層的選民中非常清楚。而在民進黨的支持者這邊，一方面，我們先前的資料指出：中高年齡層的民進黨認同者顯著傾向於台灣認同和民主態度；另一方面，他們的政黨然同和父代政黨支持的一致性，亦隨著年齡而下降。中高年齡層的民進黨支持者比較是第一代的認同者。他們對民進黨的支持比較是來自意識型態的立場，家庭社會化的作用力比較不明顯。只有當意識型態的分岐逐漸過去，家庭社會化才在新政治世代的選民中發生作用。

三、結語

政黨認同是美國選舉研究最重要的發現之一。它是美國選民投票行為的重要變項；它的穩定和變遷，也解釋了美國政黨體系的長期發展和變動。政黨認同因此成為投票行為理論和政黨發展理論中，最重要的變項之一。政黨認同如何形成，乃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問題。古典密西根模型所提出的回答是：家庭社會化。經過數十年來的批評、檢討、爭論、和再檢驗，這個解釋依然沒有被推翻。在臺灣，政黨認同現象也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關注。可是家庭社會化在台灣選民政黨認同形成上所可能發生的作用，一直沒有受到分析。原因主要來自政治環境的不同。在政治意識型態分岐顯著的情況下，台灣選民的政黨認同主要以這些分岐為分界。另一方面，台灣的政黨體系的出現不久，政黨認同者的第二代較遲出現。這些都使得家庭社會化對政黨認同的形成不致有太大的影響。

可是隨著時間的改變和意識型態分岐的消逝，目前我們應能比較適切地評估，家庭社會化這個因素在政黨認同的形成中可能發揮的作用。在本文中，我們發現，新世代的選民是否認同國民黨、或認同民進黨、或成為獨立選民，和他們的政治意識型態都沒有顯著的關連。這有別於較高年齡的選民。我們更進一步發現：如果以子代和父代在政黨認同上的一致性做為家庭社會化的指標，那麼在新政治世代政黨認同的形成基礎上，家庭社會化是唯一顯著可見的因素。我們的結論是，隨著台灣政治局面的改變，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的基礎也產生了本質性的變化：從政治學變項的「意識型態立場」轉變為社會學變項的「家庭社會化」。如果未來台灣沒有出現新的政治和社會分岐，家庭社會化的力量或將繼續形塑台灣選民的政黨認同。我們的發現，除了以台灣的資料再度支持了密西根模型的家庭社會化的理論；同時也肯定了家庭這個人類最原初的社會單位，在傳遞政黨認同上的重要性。家庭不只形塑人格，不只決定經濟地位，也不只傳遞文化品味，它甚至也高度影響了政黨認同。可惜我們目前仍缺乏兩代的訪問調查資料，無法評估在其他的政治態度上，家庭是否也發揮著類似的形塑作用。這或許是未來的政治學者可以解答的問題。

附錄 1 預測政黨認同的洛基迴歸模型（獨立選民為比較組）

年齡 19-30, 1998

	國民黨		民進黨	
	B	(S.E.)	B	(S.E.)
性別（男性=1）	-.2552	(.3272)	.1884	(.3143)
教育（小學為比較組）				
初中/高中	1.5072	(.8014)	-.3519	(.6086)
大專以上	.3606	(.8143)	-.5155	(.6100)
省籍（本省人=1）	4.7743	(12.8280)	.5758	(.7744)
民主態度（低民主態度為比較組）				
中	-.0121	(.4486)	.4902	(.4747)
高	.0157	(.4244)	.2811	(.4550)
族群認同（中國人=1）	3.8039	(12.8424)		
（台灣人=1）			.3233	(.3204)
民族認同（中國民族主義=1）	.1187	(.3885)		
（台灣民族主義=1）			.3727	(.3525)
父親政黨認同 （國民黨=1）	1.6293	(.3321)***		
（民進黨=1）			1.8280	(.3274)***
常數	-7.6288	(12.8522)**	-2.9226	(.9694)
N		313		318

*** P<.001, **P<.01

參考資料

Achen, Christopher H., 1992, "Social Psychology, Demographic Variables, and Linear Regression: Breaking the Iron Triangle in Voting Research," *Political Behavior* 14,3(September):195-211.

Barnes, Samuel H., M. Kent Jennings, Ronald Inglehart, and Barbara Farah, 1988," Party Identification and Party Closenes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olitical Behavior* 10,3:215-231.

Beck, Paul Allen, 1977, "The Role of Agents in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ed. Stanley Allen Renshon, *Handbook of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and M. Kent Jennings, 1991, "Family Traditions, Political Period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artisan Orientations," *Jounal of Politics* 53(August):742-63.

Bennett, Stephen E., Stephen C. Craig and Eric W. Rademacher, 1997, "Generation and Change: Some Initial Observations," ed. S. C. Craig and B. S. Bennett, *After the Boom: the Politics of Generation X*. Lanham: Rowan & Littlefield.

Bowler, Susan, and David Farrell, 1991, "Party Loyalties in Complete Settings: STV and Party Identification," *Political Studies* 39:350-362.

Budge, Ian, Ivor Crewe, and Dennis Farlie, 1976, "Introduction," in *Party Identification and Beyond*. London: John Wiley & Sons.

Campbell, Angus, Philip E. Converse, Warrren E. Miller, and Donald E. Stokes, 1976, *The American Voter*, Unabridged e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ang, Mau-kuei Michael, 1989, "The Formation of Party Preferences in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1986-1987," ed.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Wen-yuan Cheng, and Hou-sheng Chan, *Taiwan: A Newly Industrialized State*. Taipei: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onover, Pamela Johnson, 1991,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Where's the Politics?" ed. William Crotty, *Political Science: Looking to the Future*. Vol. 3.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Converse, Philip E., and Roy Pierce, 1985, "Measuring Partysanship," *Political Methodology* 11:143-166.

Crewe, Ivor, 1976, "Party Identification Theory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Britain," ed. Ian Budge, Ivor Crewe, and Dennis Farlie, *Party Identification and Beyond*. London: John Wiley & Sons.

Dalton, Russell, 1980, "Reassessing Parental Socialization: Indicator Unreliability and Generational Transf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4(June):421-31

Delli Carpini, Michael X., 1989, "Age and History: Generations and Sociopolitical Change," ed. Roberta S. Sigel, *Political Learning in Adulthoo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ennis, Jack and Donald J. McCrone, 1970, "Preadult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Party Identification in Western Democrac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243-263.

Dennis, Jack, and Diana Owen, 1997, "The Partisanship Puzzle: Identification and Attitudes of Generation X," ed. S. C. Craig and B. S. Bennett, *After the Boom: the Politics of Generation X*. Lanham: Rowan & Littlefield.

Eckstein, Harry, 1988, "A Culturalist Theory of Political Chang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2,3(September):789-804.

Fiorina, Morris P., 1981, *Retrospective Voting in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Gerber, Alan, and Donald P. Green, 1998, "Rational Learning and Partisan Attitud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tical Science* 42,3(July):794-818.

Green, Donald P., and Bradley Palmquist, 1994, "How Stable Is Party Identification?" *Political Behavior* 16,4:437-466.

Greenstein, Fred I., 1969, *Children and Polit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Jennings, M. Kent, and Richard G. Niemi, 1968, “The Transmission of Political Values from Parents to Chil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2:169-184.
----------, 1974, *The Political Character of Adolescence: the Influence of Families and School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81, *Generations and Politics: A Panel Study of Young Adults and Their Paren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Jennigs, M. Kent, Klaus R. Allerbeck, and Leopold Rosenmayr, 1979, “Generations and Families: General Orientations,” ed. Samuel H. Barnes and Max Kaase, *Political Action: Mass Participation in Five Western Democracies*.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Johnsonton, Richard, 1992, "Party Identification Measures in the Anglo-American Democracies: A National Survey Experi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6, 2(May):542-59.
Kaase, Max, 1976, "Party Identification and Voting Behavior in West German Elction of 1969," ed. Ian Budge, Ivor Crewe, and Dennis Farlie, *Party Identification and Beyond.* London: John Wiley & Sons.
Kamieniecki, Heldon, 1988, "The Dimensionality of Partisan Strength and Political Independence," *Political Behavior* 10, 4:364-76.
Knight, Kathleen, 1984, "The Dimensionality of Partisan and Ideological Affect: the Influence of Positivity," *American Politics Quarterly* 12, 3(July):305-334.
Knoke, David, and Michael Hout, 1974, "Social and Demographic Factors in American Political Party Affiliations, 1952-72,"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9(October):700-13.
Krosnick, Jon, and Matthew K. Berent, 1993, "Comparison of Party Identification and Policy Preferences: the Impact of Survey Question Forma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7, 3:941-64.
Lasch, Christopher, 1977, *Haven in a Heartless World: the Family Besieged*. New York: Basic Books.
MacKuen, Michael B., Robert S. Erikson, and James A. Stimson, 1989, "Macro-partisanship,"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3, 4(December):1125-42.
Miller, Warren E., 1976, "The Cross-National Use of Party Identification as a Stimulusto Political Inquiry," ed. Ian Budge, Ivor Crewe, and Dennis Farlie, *Party Identification and Beyond*. London: John Wiley & Sons.
----------, 1991, "Party Identification," ed. L. Sandy Maisel,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Parties and Elections in the U.S.*. N.Y.: Garland Publishing.
---------- ，and J. Merrill Shanks, 1996, *The New American Voter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Nathan, James A., and Richard C. Remy, 1977, “Comparativ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ed. S. A. Renshon, *Handbook of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Niemi, Richard G., M. Kent Jennings, 1991, "Issues and Inheritance in the Format of Party Identific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5:970-88.
Renshon, Stanley, 1992,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ed. Mary Hawkesworth and Maurice Kogan, *Encyclopedia of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vol. 1. London: Routledge.
Schickler, Eric, and Donald P. Green, 1997, “The Stability of Party Identification in Western Democracies: Results from Eight Panel Survey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0,4(August):450-483.
Searing, Donald, Gerald Wright, and George Rabinowitz, 1976, “The Primacy Principle: Attitude Change and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January):83-113.
Sears, David O., 1990, “Whither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Research?--the Question of Persistence,” ed. Orit Ichilov,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Citizenship Education, and Democracy*.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Sears, David O., and Nicholas A. Valentino, 1997, “Politics Matters: Political Events as Catalysts for Preadult Socializ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1, 1:45-65.
Shively, W. Phillips, 1980, "The Nature of Party Identification: A Review of Recent Developments," ed. John C. Pierce and John L. Sullivan, *The Electorate Reconsidered.*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Wilson, Richard W., 1970, *Learning to Be Chinese: th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of Children in Taiwan*. Cambridge: the M. I. T. Press.
Wu, Naiteh, 1997, “Re-searching National Identities in Taiwan: Findings, Puzzles, and Agend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Postwar Taiwan, sponsored by the Joint Center for Eastern Asian Studies,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and University of Missouri-St. Louis, October 16-18.
何思因，1994，「台灣地區選民政黨偏好的變遷：1989-1992」，*選舉研究* 第三卷 第1期：39-52。
何思因、吳釗燮，1996，「台灣政黨體系之下政黨認同的測量方法」，*選舉研究* 第三卷 第1期：1─16。
劉義周，1994，「台灣選民政黨形象的世代差異」，*選舉研究* 第一卷 第1期：53─73。
吳乃德，1993，國家認同與政黨支持，*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74: 33-61.
---------，1995，社會分歧和政黨競爭：解釋國民黨為何繼續執政。*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第78期：101-130。
游盈隆，1996,「台灣族群認同的政治心理分析」，*台灣政治學刊* 第一期：41-84。
徐火炎，1991,「政黨認同與投票抉擇：台灣地區選民的政黨印象、偏好與黨派投票行為之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4（1）：1-57.
--------，1993，「選民的政黨取向、政黨認同與黨派投票抉擇」，*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 3（2）：144-166.